

个，在当地开展新技术、新项目近2094个。中山、华山等各大医院，每年都会以国家巡回医疗队等形式开展医疗援助，足迹遍新疆、西藏、云南、甘肃、内蒙古等中西部地区、革命老区和深度贫困地区，送医送药，快速带动当地学科、医院的发展。

在我国历次大灾大难中，都有上医人参与医疗救援的身影。上医人还走出国门，为巴基斯坦、摩洛哥和马达加斯加等国家提供了医疗援助。

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。为国为民，上医人的情怀挥洒，不以山海为远。

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、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表示，95年来，“为人群服务，为强国奋斗”的精神已经融入上医人平凡的生活和工作，一代代上医人用精湛医术、高尚医德践行“正谊明道”的院训，仁爱始终，立人为国。

继医学初心

“叮咚”，每当有人经过入口

的木门，这样的提示铃声总会响起，似乎也在提醒到访的人们，他们即将参观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。“去之前觉得很神秘，甚至有些害怕；去了之后，感觉得到了心灵的洗礼。”无论是否医学专业、无论是否在校师生，在众多观众那里，位于上医东9号楼的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常常得到这样的评价。这里不仅以实物标本的形式展示了人体的奥秘，更让人体会到遗体捐献的意义、“大体老师”的奉献。

由于肉眼看到的整体器官是大体形态结构，医学界将尸体标本称为“大体”，称遗体为“大体老师”。人体科学馆中，年龄最小的大体老师，当属人们一进去就能迎面看到的一对在腹中存活了五个月的双胞胎，她们是上医创始人颜福庆早产的小孙女。

捐献遗体的多少和尸体解剖率的高低，往往是一个国家公民文明程度和国家卫生状况的重要标志。遗体捐献在中国的历史与上医病理学教授、曾任上医代理院长的谷镜汧紧密相联。他在国内最先倡导遗体捐献，又在生前立下捐献志愿书。

复旦大学的老校长谢希德院士以及她的丈夫曹天钦院士，都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。

1982年，上海市在上医等六个医学院校建立“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”，上医开始接收被捐献的遗体。目前复旦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的接收量占上海的40%，居全国首位，基本能满足教学需要。除了遗体接受站，在上医的病理标本博物馆和人体科学馆，有大概5000件标本来自不知名的逝者无偿捐献。

遗体捐献接受站会给每一位捐献者家属送上一个琥珀色的小纪念碑，上面可以镶上捐献者的照片，以供追思。生命虽然在逝者的身体上终结了，但以另一种形式，在医者悉心治疗下痊愈的人们身上得到了延续。

纪念碑不仅镌刻着遗体捐献者的功绩，也是所有上医人心中的一块指路石：医学之径的终点，是无尽的奉献。

“我给医学本科生上免疫学概论的第一课时，总会告诉他们：选择了医学，就要准备好为科学作出奉献和牺牲。”复旦上医免疫学系团队带头人、基础医学院教授储以微告诉《新民周刊》记者。

她说，免疫学是从病原生物学中发展分支出来的，数百年来，人类在两者的探索中，医者一直都在直接奉献生命健康，把风险留给自己，“抽自己的血做实验”“亲身最先试验新疗法”的例子举不胜举。

医者在医疗领域本身当然要过硬。上医自成立以来，就不断书写着各类临床治疗、基础科研的突破纪录；同时，还培育着优秀的医学生。

储以微个人以及团队，分别获

左图：复旦上医创建95周年沉浸式演出《身聆上医》中，观众们参观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。

摄影 / 刘永辉

